

· 文化研究 ·

## 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文化发展范式之争

张庆熊

**摘要:** 斯拉夫主义的缘起和发展与“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有着密切关系。这两场战争从正反两方面加剧了俄国知识界对俄国道路的思考和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认知。斯拉夫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它通过反思俄罗斯成败得失的原因何在,从而认识到俄国不同于西欧,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应该走具有斯拉夫特色的发展道路。“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俄国的独特性并重新审视西方文明。“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知识分子分为两派:西欧派主张俄罗斯应全面学习西方,而斯拉夫派则认为模仿西方的改革并不够,需要从自身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西方派秉持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发展范式观,认为西方不但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社会制度也先进,西欧是俄罗斯学习的榜样,西方的发展模式具有普世意义,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代表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普遍的发展方向。斯拉夫派秉持一种“文化纯洁性”的概念,认为斯拉夫文化传统是俄罗斯纯粹的本土文化传统,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将斯拉夫文化和非斯拉夫文化的差异本质化和绝对化。斯拉夫主义的文化发展范式是一种本土单一文化发展范式。欧亚派持一种跨文化的发展范式,认为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承认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主张文化是一种相互交流的共生现象,不仅斯拉夫的东正教文化,还有亚洲文化的因素,都在俄罗斯文化大家庭中发挥积极作用。欧亚派修正了斯拉夫主义过分简化的俄罗斯身份描述,同时反对西方派的普遍主义的亲西方立场,勾画了一幅俄罗斯的文化发展战略图景。

**关键词:** 斯拉夫主义; 欧亚主义; 俄罗斯文化; 文化发展范式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2020CSZZ003)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受到东西方文化双重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特性。俄罗斯既得益于跨文化的交流,又受到东西文化的冲击。俄罗斯时常徘徊在“欧洲边陲”与“欧亚帝国”双重身份之间,时而流露出一种被边缘化的危机感,时而激扬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从历史上看,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开启了沙俄的强国之路,而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失败又使俄罗斯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于是在俄罗斯文化哲学的讨论中经常出现两种声音之争:一种是“西化”的呼声,主张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寻求融入欧洲;另一种是“斯拉夫主义”的呼声,主张俄罗斯文化基于东正教,具有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内涵,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团结斯拉夫各民族并承担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然而,俄罗斯文化是跨文化的产物,受希腊、西欧和亚洲文化的多元影响。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东正教教义等为俄罗斯精神文化奠定基础;西欧哲学思想在不同时期影响俄罗斯哲学发展;亚洲波斯、突厥、蒙古、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也与俄罗斯文化交融。当今,俄罗斯流行的欧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种跨文化的

发展范式:在跨文化背景下加强交流和沟通,同时坚持俄罗斯自主的价值导向,走俄罗斯特色的振兴文化之路。本文通过梳理俄罗斯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哲学形态,探讨它们的得失,以期对思考文明互鉴和文化发展问题有所启发。

## 一、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斯拉夫主义的缘起

相比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文化还相当年轻。俄罗斯脱胎于东斯拉夫部落。基辅罗斯时期(882—1240),东斯拉夫人建立了一些较为统一的公国,那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拜占庭帝国有着密切联系。后来,莫斯科公国在摆脱蒙古统治后迅速崛起,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和政治整合,逐渐统一了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到了沙皇俄国时期,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等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18世纪末至19世纪,俄国经历了农奴制危机、十二月党人起义等重大事件,传统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启蒙思想与民族意识觉醒。在这一过程中,俄国贵族阶层接触欧洲文化,同时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俄国文化的独特性,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翻开俄罗斯的文化史,19世纪堪称“黄金时期”,那时的文化巨匠有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期”是接着“黄金时期”说的,其时间跨度大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尽管持续时间较短(约20年),却成为俄国文化史上充满张力和耐人寻味的阶段。那时的俄罗斯经历了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十月革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种思潮纷争不断,政治立场趋于极端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变得更加保守,转向在哲学、宗教、艺术中寻求精神救赎;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激进革命的道路,希望在俄罗斯的广袤大地上建立人间天堂。这种在思想观点上的尖锐对立也体现在文学和哲学作品中。一部分作家强调直觉、象征、形式创新,探索潜意识、梦境、神秘主义等主题;而另一部分作家彻底否定传统,推崇技术文明、速度、断裂感,主张思想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在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缘起和发展与“拿破仑战争”(1812)和“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有着密切关系。这两场战争前者战胜,后者战败,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加剧了俄国知识界对俄国道路的思考和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认知。斯拉夫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它通过反思俄罗斯成败得失的原因何在,从而认识到俄国不同于西欧,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应该走具有斯拉夫特色的发展道路。

“拿破仑战争”对俄罗斯而言是一场民族保卫战。拿破仑为在欧洲争夺霸权地位和遏制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于1812年率60万大军入侵俄国。俄军采取焦土战术,主动放弃莫斯科,诱敌深入,迫使拿破仑的法军陷入补给困境。寒冬降临后,法军因饥寒交迫而撤退,俄军追击并最终击溃法军,歼敌超30万。胜利后俄国俨然成为欧洲的救世主,民族自豪感高涨。这时候,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俄国的独特性。为什么当时军事力量和科技相对落后的俄国能击败强大的法国呢?他们认为这与俄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有关。俄军的胜利被解读为“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胜利,而非单纯军事成就。在战争中,出现俄罗斯农民自愿参军的全民抗敌景象,这让俄罗斯知识分子看到俄国传统社会结构(如村社、东正教)的强大凝聚力,他们提出“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概念,认为俄国的胜利源于东正教教会与民众在精神上的“有机统一”,这种“聚合性”是西方个体主义无法企及的强大力量。这场战争也使俄罗斯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西方文明。那时,俄军追击法军时进入西欧,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目

睹了法国革命后社会分裂、道德沦丧的局面,以及伴随宗教信仰淡化而出现的个人主义泛滥和纵情于物质享受的社会现象。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已沦为理性的奴隶,而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保留了基督教的真正精神。

克里米亚战争本质上是一场以俄罗斯为一方和以英法为另一方的欧洲列强争夺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战争。19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成为欧洲列强眼中的“猎物”。俄罗斯的统治者沙皇尼古拉一世试图向南方扩张,控制黑海海峡,以获得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权,英国和法国也希望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遏制俄国的扩张。这场战争也涉及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因素。在奥斯曼帝国内,特别是在现今的乌克兰和巴尔干地区,居住着大量斯拉夫人,存在着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矛盾。法国支持天主教,俄国以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信徒的保护者自居。此外,双方在宗教圣地的管辖权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1852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在法国压力下将圣地管辖权交给天主教徒,引发俄国强烈不满,这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这场战争持续时间很长,从1853年至1856年,并且非常残酷,造成大约65万人死亡,以俄国战败而告终。战争期间,俄军指挥体系混乱,军事装备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后勤保障不足,部分官员贪污军饷。这使得民众对沙皇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原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沙皇权威开始动摇。这场战争暴露了俄国的落后,尤其是与西方的差距。

这时候,俄罗斯知识分子分为两派:西欧派主张俄罗斯应全面学习西方,彼得大帝以来那种只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技的路线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社会制度改革,如废除农奴制,因为农奴在法律上依附于地主,缺乏生产积极性,农奴也无法自由进入工厂工作,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斯拉夫派则认为战败是因为俄罗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背离了自己的传统,导致传统制度(如村社、东正教)被削弱,社会凝聚力涣散,因而模仿西方的改革并不够,需要从自身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

这两场战争对俄罗斯社会及其文化形态产生重大影响,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俄罗斯的艺术作品和哲学论著中读到。例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涵盖奥斯特里茨战役、博罗季诺战役、莫斯科大火、法军撤退等关键事件,托尔斯泰还将这场战争与俄国民族精神的觉醒贯穿起来,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策略,更源于民族整体的精神凝聚力。有关克里米亚战争,托尔斯泰则以1854—1855年间驻守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了三部短篇合集(《塞瓦斯托波尔在1854年12月》《1855年5月》《1855年8月》),真实地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士兵的心理状态,以及俄军指挥体系的弊端。津科夫斯基在《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一书中写道:“克里米亚战争震动了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这个俄国社会在紧张地关注着塞瓦斯托波尔周围发生的英雄主义的战争,并且认识到了与西方相比自己全部科学的落后和社会的落后,以及俄罗斯生活的一切谎言和全部缺陷;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也强烈地感觉到西方人民就是敌人。”<sup>①</sup>

正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即1855年,斯拉夫派创办了《俄罗斯谈话》杂志。在1859年,斯拉夫派的思想家A. C. 霍米亚科夫起草了一封致塞尔维亚人的信函,联合签署的还有波果金、科舍廖夫、H. 叶拉金、Ю. 萨马林、И. 阿克萨科夫等,该书信集中表述了斯拉夫派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立场的批评态度:“西方民族达到了理智的高级发展,然而却沉迷于自己的成就,他们一方面对最高的善——信仰漠不关心……而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把其他人类看作善人,而是看成敌人……全世界都认为欧洲民族的船舶不是和平与幸福的信使,而是战争和巨大

<sup>①</sup> B. B. 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10页。

灾难的信使。”<sup>①</sup>

## 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对峙和两种世界史观的塑造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式和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主张。老一代的斯拉夫派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伊凡·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等；老一代的西方派代表人物有恰达耶夫、别林斯基、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当然，这一标签不是绝对的，因为其中有的人物（如赫尔岑）前后思想有所转变。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斗争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彼得大帝寻求向西欧学习伊始，这场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俄罗斯是否应该向西欧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能，而在于是否应该保持俄罗斯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统。渐渐地这场斗争上升为文化哲学之争，即西方的道路是否意味着世界历史的普遍道路，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是否代表人类文明普遍的发展方向。在西方派看来，俄国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主旋律中的一段“插曲”，全盘西化以融入欧洲文明，俄罗斯才有前途。斯拉夫派则持与西方派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俄罗斯文化不仅与西欧文化不同，还蕴含普遍的历史意义。他们强调，俄罗斯的传统是东正教文化，东正教代表基督教的正统，保持了基督教“灵智”的内在精神性和社会“聚合性”的力量，而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文化走偏了方向，导致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泛滥，西方已经没落，俄罗斯才代表世界历史的方向。

引发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激烈论战的是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玛雅·索博列娃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哲学》一书中指出：“两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文化自我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的历史哲学思想。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的发表（1836）发挥了显著作用，亚历山大·赫尔岑把这封信描绘为‘像夜里的一声枪响’，引发了关于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文化归属的‘秘密’的激烈讨论。这次讨论形成了两个阵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sup>②</sup>

恰达耶夫被视为“西方派教父”。他的《哲学书简》创作于1823年至1831年间，以八封书信体写成，其中的第一封书信于1836年刊登在《望远镜》杂志上，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恰达耶夫的这封书信被许多保守派视为离经叛道和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否定，这导致《望远镜》杂志被查封，恰达耶夫也被沙皇当局宣布为“疯子”。确实，恰达耶夫的书信言辞刻薄了一些，刺伤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俄罗斯的封闭落后和沙皇误国殃民的治国方略。他写道：“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组合进人类，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一个严正的教训。”<sup>③</sup>然而，恰达耶夫的本意也像斯拉夫派一样，在寻求一条拯救俄罗斯的道路。当然，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立足于俄罗斯本土文化的道路，另一条是西化的道路。在恰达耶夫看来，要振兴俄罗斯，必须克服东正教文化的孤立主义心态，全面融入欧洲文明，通过接受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与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实现全面现代化。恰达耶夫呼吁：“您愿意承认这也是思想吗？这就是义务、正义、权利和秩序的思想。它们诞生于构成社会的那些事件本身，它们作为不可或缺的成分进入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这也构成了西方的氛

① B. B. 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111-112页。

② Maja Soboleva, *Russische Philosophie im Kontext der Interkulturalität*, Nordhausen: Traugott Bautz, 2007, S. 57.

③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9页。

围;这比历史还要丰富,比心理学还要深刻:这就是一个欧洲人的生理构造。”<sup>①</sup>

恰达耶夫持一种进阶论的社会历史观,他指出当初的西欧亦曾被黑暗所包裹,而现在多少已为明亮的光线所映照,因此他呼吁在俄罗斯也进行像西欧那样的启蒙运动,把光亮照到黑暗处。恰达耶夫的思想成了俄罗斯社会启蒙的催化剂,其批判精神激发了赫尔岑、别林斯基等知识分子的反思,他们为恰达耶夫的基本主张辩护,形成俄罗斯文化哲学中的西方派阵营。

西方派多少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世界文明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阶过程,世界文明的发展遵循世界精神展开的正反合三环节辩证模式。东方文明处于发展的低阶,波斯文明是过渡性的中介,西方文明位于发展的高阶。西方文明的第一环节是希腊文明,第二环节是罗马文明,第三环节是日耳曼基督教新教文明。黑格尔认为,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性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由此建立自由和法治相结合的现代国家。启蒙运动在法国掀起狂澜,随后拿破仑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和政治改革,将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传播到欧洲各地,冲击了欧洲的封建秩序。因而,黑格尔称拿破仑为“骑在马上世界精神”。当时,在德国建立了在法律秩序保障下的个体自由的社会制度。由此,黑格尔把日耳曼文明说成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

西方派多少相信了黑格尔的这一说法。在西方派看来,西欧不仅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生产方面领先,而且在社会、政治和艺术领域都是典范。俄罗斯文化和西欧文化在古代就有共同的根源。它们不仅都源于犹太—基督教,而且都继承“希腊化遗产”。如果说差别的话,那么西欧的天主教文化在中世纪后期转向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俄罗斯的东正教历来倚重柏拉图主义。西方人经由亚里士多德而转向重视逻辑推理和经验实证的科学态度,并通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建立现代化的法治国家。而俄罗斯长期处于孤岛式的封闭状态中,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时代精神。很长时间以来,俄罗斯既未产生原创性思想,亦未推动社会进步,失落在历史前进的主流之外,就像被精神世界抛弃的孤儿一样。在他们眼里,俄国历史长期处于“野蛮—蒙昧—暴政”的恶性循环中,东正教成了“蒙昧主义的帮凶”,农奴制则是“野蛮统治的合法化工具”。因此,以恰达耶夫为代表的西方派主张废除农奴制,以西欧为标杆,建立基于理性与法治的现代国家。

斯拉夫派的很多核心观点是通过对西方派的批评而表现出来的。西方派的重心在于阐明西欧的道路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意义,而斯拉夫派的重心在于申明俄国道路的独特性。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描述为普世文化的推广者与本土文化的拥护者之间的冲突。斯拉夫派批评西方派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对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一股脑儿抛弃。斯拉夫派并非拒绝向西方学习,但主张这种学习必须出于对俄国国情的深切理解。按照霍米亚科夫的看法,文化是一个生命体,生命必须与本土的环境相适应。任何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必定是扎根在民众生存大地上的文化,并总是与那里土生土长的民俗风情和民间语言交融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化是生存在俄罗斯大地上的文化,充盈着俄罗斯土壤的气息,贯穿着东正教的信仰传统,是一种对俄罗斯民族具有亲和力的文化。西方派借助所谓“启蒙运动”推广西欧的文化,是“殖民驱动力”在作祟。西方派的拿来主义的文化观缺乏对本土文化生命意义的理解,“进口文化模式”必定水土不服,对俄罗斯有害无益。

斯拉夫派批评西方派只看到西方表面上的先进,没有看到西方实际上已经生病了,没有看

<sup>①</sup>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10页。

到西方人生活中出现了道德危机。霍米亚科夫在《论新与旧》中指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本身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越是往前走，就越会发觉他们的社会非常糟糕且缺乏道德。”<sup>①</sup>阿克萨科夫认为，西方的所谓法治社会缺乏精神力量的根基，是徒具形式的空壳：“在西方，精神在衰退，被国家体制的改良和警察局的完善所取代，同时，良心被法律取代，内心动机被条例取代，甚至慈善事业也变为机械的事情；在西方只关心国家体制。”用霍米亚科夫的话来说，“[西方]衰亡的不是制度，而是精神原则，不是社会条件，而是社会和进入社会的人们赖以生活的信仰”<sup>②</sup>。

斯拉夫派认为西方在发展过程中丢弃了基督教的精神性原则，而这种原则在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还保留着。按照斯拉夫派的看法，由于西欧文化的片面理性主义、形式主义、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世俗化倾向，西方社会失去了基督教的信仰支柱，国民团结难以维系。西方将会衰落，将让位于更好的精神原则拥护者的社会。当西方被一系列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弄得筋疲力尽的时候，西欧就不再能保持其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时俄罗斯就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前提是俄罗斯要发扬自己文化中的精神性原则，要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主义的泛滥。

霍米亚科夫在《世界史札记》中构想了一种与黑格尔不同的世界历史发展图式，其核心要点是否定黑格尔以基督教新教和日耳曼帝国为世界历史发展高峰的论点，而主张将俄罗斯“有机整体”社会作为理想性标杆。霍米亚科夫的世界史观有点新柏拉图主义或诺斯替主义的味道。早期基督教曾流行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主义的世界图式：上帝原初创造了一个精神性的光明世界，后来发生了堕落，流溢出黑暗的物质世界。人现在所居住的大地，是被恶魔支配的黑暗的物质世界，但是在人的心灵中还保留“诺斯替”的灵智，“诺斯替”意味着一种能内在心地体认到精神原则的灵性的认知能力。上帝委派救世主拯救人类，通过赎罪焕发人的良心（灵智），拯救人的灵魂摆脱黑暗世界的牢笼而升入天国的光明世界。霍米亚科夫对这种世界图式进行了一番改造和重新解释。他沿用基督教有关世界历史是一个创造、堕落和救赎的过程的传统说法。他认为，上帝原初创造了一个有机整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相对于必然居支配地位，精神相对于物质居支配地位；后来发生了堕落，自由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颠倒过来；最后，通过基督的拯救又恢复有机整合的社会。

霍米亚科夫认为，精神原则表现为自由，物质原则表现为必然性，前者是善，后者是恶，这两个原则在宇宙的各个层面上都起作用，它们之间的斗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他在《世界史札记》中写道：“自由和必然性构成了人类所有思想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秘密基础。”<sup>③</sup>根据霍米亚科夫的说法，自由原则在文化中实现为“伊朗”类型，而“库什”类型的必然性原则则以圣经中提到的库什土地（埃塞俄比亚）命名。当然，这只是理想型的描述方式的文化；事实上，每一种文化都是由这两种元素混合和交织而成的。伊朗型和库什型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的特点：历史上有许多伊朗文化类型堕落的例子。犹太人本是一个从伊朗流浪到巴勒斯坦的部落，他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在于创造了《旧约》。然而，他们后来否认耶稣基督，从而否认了他们自己的传统，结束了他们历史上的这一创造性时期，并开始转向“库什”型文化。

霍米亚科夫还认为，早期基督教是伊朗精神（自由精神）的充分体现，但是后来也被“库

① 霍米亚科夫等：《俄国思想的华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② B. B. 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79、79-80页。

③ Maja Soboleva, *Russische Philosophie im Kontext der Interkulturalität*, S. 16.

什”文化因素渗透腐蚀。这表现在被罗马帝国收编的罗马教会中。罗马帝国崇尚库什主义的法律秩序,好战和对被统治者施加暴政,罗马天主教会往往成为罗马统治者的帮凶。基督教的新教改革非但没有克服库什主义的因素,反而加深了它。黑格尔声称日耳曼帝国体现了自由与秩序的最佳结合。然而,那里的自由只表现为个人追求物质财富的自由,那里的秩序是在法律强制下的秩序。在那里,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渗透到所有社会结构中,社会分裂成单个原子,社会矛盾激化。西方文明所体现的正是库什主义的原则,即对必然性、物质和形式的崇拜,而这是西方文明堕落的根本原因。

在霍米亚科夫看来,只有在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中,还保留了早期基督教崇尚的精神性原则,这具体表现为“灵智”“爱”和“聚和性”。“灵智”是一种认识真理的能力。然而,这种真理不像西方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形式逻辑和经验事实的真理,而更重要的是有关造物主神的真理和人的内在心灵的真理。东正教文化重视良心的反省,以一种神秘直观的方式认识宗教信仰的真理。这种认知方式与间接的逻辑推演不同,它具有直接性,在一瞬间中激发“灵智”的火花,与神灵交融,直观真理。用希腊哲学术语来说,这就是索菲亚的智慧。由于东正教文化传统保留了索菲亚的智慧,因此能克服西欧启蒙运动导致的片面的理性主义思潮。霍米亚科夫还认为,西欧的现代文明片面地理解了自由。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自由只是被理解为个体的自主性,即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决断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忘记了“自由”必须与“爱”相结合,否则个体的自由就会导致个人主义,社会就会分裂。西方的所谓法治社会企图通过法律和制度监管来维持个人主义原则支配下的社会秩序,但是这种社会秩序肯定是不稳固的,因为它缺乏“爱”的道德基础。东正教在讲自由的时候,总是强调爱的情怀,这样人与人之间才有牢固连接的爱的纽带,社会才能整合为一个友爱的整体。在自由中如何走向统一呢?要依靠爱。建立在自由和爱基础上的统一体,就是“聚和性”。东正教文化充盈“灵智”“爱”和“聚和性”的特征,所以优胜于西方文化。

总之,斯拉夫派分析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他们认为西方已经病入膏肓,俄罗斯虽然受到西方传染,但病得还轻,还能得救。在俄罗斯,受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侵蚀的,主要是那些受过西化教育和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知识精英阶层,而广大劳作在俄罗斯大地上脚沾乡土气息的人民还没有受到传染。为拯救俄罗斯,就需要改变那种唯西方是从的心态,这需要将俄罗斯的文化教育置于新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为复兴俄罗斯主要不是依靠理性知识,而是东正教信仰。只有正统正义的基督教信仰才能导向俄罗斯的复兴,并使得俄罗斯能够承担拯救整个欧洲乃至全人类的使命。

### 三、作为斯拉夫主义替代的欧亚主义文化范式

从形成年代看,“欧亚主义”比斯拉夫主义晚起,在思想观点上与斯拉夫主义接近,但也有所差别,可以说是“斯拉夫主义”的更新换代。从字面上看,“斯拉夫主义”是从民族上说的,而“欧亚主义”是从地域上说的。欧亚主义主张,俄罗斯在地理和历史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在地理、民族志、经济、历史和文化上表现出欧亚复合性的特色,形成了一个具有跨文化内涵的综合实体,因此以“欧亚主义”一词来表达俄罗斯的文化发展范式更为确切。我们可以通过对照斯拉夫主义来概述欧亚主义的主要观点。

一是跨欧亚大陆的地缘定位。强调俄罗斯既非纯粹的欧洲国家,也非纯粹的亚洲国家,而是横跨欧亚大陆,融合了欧亚大陆诸民族及其历史文化,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俄罗斯独

特的历史使命和文化特性。这一观点与斯拉夫主义有所不同,它正视了俄罗斯地域上生存的不仅仅是斯拉夫民族,还包含中亚和东亚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实际情况,便于团结俄国各民族和形成国家凝聚力。

二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反对将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强加于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不应盲目追随西方,而应揭示西方文化的弊端,抵制西方的错误倾向。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西方派,他们认为西方派的理论实质是将西欧文明视为唯一的发展方向,这将导致否定俄罗斯自身文化价值和自身文明的存在意义。这一观点与斯拉夫主义是一致的。

三是倡导建立一个适应俄罗斯国情的欧亚国家。有鉴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多民族共存的国情,主张尊重各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价值“生态”,倡导联邦制,同时为了在多样化中保持协调一致,要求其人民发展成“交响乐人格”。“交响乐人格”概念包括民族文化、宗教和国家三个方面:民族文化是多样性的,俄罗斯文化应被视为一种多元性的跨民族文化的生态;东正教是欧亚文化的精神支柱,应通过“日常忏悔”等宗教礼仪活动,渗透到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发展成一种精神生活的调节力量;国家是一个自下而上和组织严密的权力金字塔。形象地说,交响乐丰富多彩的乐章和不同乐器的演奏者象征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态,这一交响乐的主旋律是东正教,它的总指挥是俄罗斯国家政权。这一观点与斯拉夫主义很接近。

欧亚主义分为两代。老一代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Трубецкой)、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萨维茨基(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авитский)、列夫·卡尔萨温(Лев Платонович Карсавин)等。新一代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ёв)、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帕纳林(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анагин)、亚历山大·格列耶维奇·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льевич Дугин)等。老一代欧亚主义形成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20世纪20年代,到了30年代后期就已经分裂和走向终结。新一代欧亚主义形成于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并一跃成为后苏联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虽然这两代欧亚主义间隔的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但思想观点上有迹可循。欧亚主义的复兴标志着从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后苏联时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转变。

从历史文献看,欧亚主义的第一次宣告见于1921年6月3日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召开的一次研讨会及随后发表的论文集《走向东方·预感和事件·欧亚主义的确立》(以下简称《走向东方》)。该论文集收录了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经济学家兼地理学家萨维茨基、音乐评论家苏切温斯基和思想史学家弗洛罗夫斯基等人的10篇论文。这四人可谓欧亚主义最初的创始人,诚然其中有人后来离开了该运动,如弗洛罗夫斯基。该论文集的出版推动了欧亚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促成了后续多次欧亚主义研讨会的举办,以及多份欧亚主义宣告文件的发布,其中包括1926年在巴黎出版的《系统阐述的尝试:欧亚主义者》<sup>①</sup>。以下我主要依据《走向东方》概述老一代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

《走向东方》开篇序言明确宣告,欧亚主义是一种俄罗斯原创性的民族主义,它与欧洲民族主义的差别在于它突破了西欧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

<sup>①</sup> 该文件收录于霍米亚科夫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199-213页。

在世俗事务中,我们的态度是民族主义的,但我们不想将这种态度局限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之内。此外,我们认为,俄罗斯的原生性和创造性民族主义,由于其本性,正在撕裂和瓦解西欧尺度上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疆界,这些疆界无法容纳它;甚至在种族意义上,它也像俄罗斯森林和草原一样,广泛地延伸到全球各地。<sup>①</sup>

该序言还指出,尽管欧亚主义在许多方面与斯拉夫主义站在一起,但它比斯拉夫主义更符合俄罗斯国情。斯拉夫主义的民族概念缺乏广泛的包容性,难以团结多民族的俄国人民实现其愿景,“斯拉夫世界”的概念在“现实的法庭”上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欧亚主义的概念对俄国各族人民来说更有亲和力:

因此,我们将我们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指向“斯拉夫”,而是指向整个“欧亚”世界的一系列民族,其中俄罗斯人民处于中心地位。将整个东欧和亚洲民族纳入俄罗斯世界文化的精神领域,似乎是出于一种秘密的“灵魂亲和力”——这使俄罗斯文化对这些民族变得可理解且亲近,同时确立了他们参与俄罗斯事业的丰饶潜力——以及他们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sup>②</sup>

俄罗斯贵族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欧亚主义派别的形成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于1920年移民至保加利亚,在索非亚大学任教,他的《欧洲与人类》(1920)一书为欧亚主义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在索非亚召开的那个有关欧亚主义的研讨会上他是召集人并作了主旨讲演。特鲁别茨科伊从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考证了俄罗斯民族和文化形成的历史。他指出,在俄罗斯社会中,特别是在教育界中,普遍把俄罗斯文化归结为斯拉夫文化,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写道: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指满足特定环境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文化资产总和)是一个绝对独特的整体,无法准确归类到任何更广泛的文化区域或文化群组。总的来说,这种文化构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区,其中包括俄罗斯人、乌拉尔—芬兰人和伏尔加流域的突厥人。向东和东南方向,这种文化几乎无缝地过渡到草原上的突厥—蒙古文化,进而与亚洲文化联系在一起。<sup>③</sup>

按照斯拉夫主义的看法,俄罗斯文化本质上是斯拉夫文化,俄罗斯国家本质上是斯拉夫民族的国家。特鲁别茨科伊认为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他指出当今俄国的巨大版图与成吉思汗帝国之间存在历史的连续性。不可否认蒙古帝国是第一个将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到西伯利亚的整个欧亚大陆纳入版图的国家。鞑靼可汗在莫斯科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被视为俄罗斯的共同创造者。为了论证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他还从语言学上考证了俄语实际上是斯拉夫语与图兰语相交融的产物,是一种“语言联盟”。这证明中亚突厥语系的各民族是俄罗斯文化建构中的积极参与者。他认为,这种“语言联盟”连接了欧亚大陆的语言,构成

① Savitsky, Suhevinsky, Florovsky, Trubetskoy, *Exodus to the East: Forebodings and Events: An Affirmation of the Eurasians*, Idyllwild, CA: Charles Schlacks, p. 4.

② Savitsky, Suhevinsky, Florovsky, Trubetskoy, *Exodus to the East: Forebodings and Events: An Affirmation of the Eurasians*, p. 4.

③ Savitsky, Suhevinsky, Florovsky, Trubetskoy, *Exodus to the East: Forebodings and Events: An Affirmation of the Eurasians*, p. 88.

了欧亚文化的基础,而且图兰元素对俄罗斯文化的贡献是积极的,因为“图兰精神”提供了文化稳定性的力量,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活动。

在特鲁别茨科伊看来,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没有高下之分,文化是多元并行的,而不是高低阶梯的。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只要能适应其生存环境就是好的文化。“原始文化”一词是西方人炮制的伪命题,目的在于证明西方文化优越于非西方文化,是为了让非西方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西方的特别狡猾之处就是将其价值体系强加于其他民族,从而促使他们走向欧洲化。西方人诱惑非西方民族臣服于西方的三部曲是:(1)利用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知识成就方面的优势吸引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2)宣扬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成就是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鼓动非西方国家进行全盘西化的改革;(3)利用非西方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削弱这些国家,实现西方控制整个世界的霸权目标。特鲁别茨科伊认为,接受外国价值观需要耗费大量社会能量,这导致知识分子与民众分离,加剧内部冲突,更有利于罗马—日耳曼人寻找空隙,进行经济和军事的扩张。

萨维茨基从地缘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欧亚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如果从总体上考察“俄罗斯欧亚大陆”的文化拓扑,会发现它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俄罗斯的亚洲东部。而且,这符合欧亚人的关切,他们现在站出来反对西欧的文化统治,并希望发展一种可以替代经典欧洲文化模式的价值体系。正因为如此,他写了《走向东方》这篇论文,并作为第一篇文章收入该文集。“走向东方”(Exodus to the East)是相对于“西方派”的立场而言的,为了突出欧亚派的这个主旨思想,“走向东方”显现在该文集的书名标题中。欧亚主义者反对西方派所持的以西欧模式为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绝对进步的观念,反对在文化比较中存在普遍有效的标准。他们主张文化发展的非线性特征,认为文化不会停留在同一地点,其中心会移动,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不断变化,不能用普遍的标准加以测量和评估。

萨维茨基还提出了“大陆感”与“海洋感”的概念,以此论述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的差别。他认为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族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对俄罗斯人的心态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陆感”。这种独特的“大陆感”是由草原游牧和粗放农业的作息模式经年累月的积习而形成的,这与西欧人典型的“海洋感”有很大不同。西欧人的“海洋感”是由于集约化工农业而发展出来的,这导致西欧人追求经商利益和寻求海洋霸权。针对这样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心态的格局,欧亚主义者尝试建构一种“欧亚大陆”与“岛国列强”相对峙的地缘政治学说。

萨维茨基在《大陆与海洋:俄罗斯与世界市场》一文中指出,随着西方进入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对于那些在世界上以其“大陆性”而著称的国家来说,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困境,因为它们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而它们的工业又十分落后,因此它们的对外贸易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地位。世界贸易对于海洋强国来说,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产品,也会有更多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产品。然而,对于大陆国家来说则面临两难抉择:如果与世界隔绝,其命运将是与“自然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落后状态;如果参与“世界经济”,则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被岛国列强“剥夺”的处境。在这种世界格局中,岛国列强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大陆国家遭受剥夺的经济负担之上。

欧亚主义者构想出一种大陆国家对抗欧美岛国列强的地缘政治战略方案,包括经济、外交和军事三个方面。在经济上,大陆国家相比岛国列强也有某些优势:大陆国家通常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自给自足能力强,而岛国列强大都自然资源短缺,产品单一,需要依赖商品交换

维持生存。大陆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内部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发展经济,形成区域互补,并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地位与岛国列强洽谈贸易关系。在外交上,大陆国家应结成联盟,对抗岛国列强的经济剥削和军事侵略。在军事上,大陆国家也应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守卫领土,维护自己必要的出海口的航行安全。萨维茨基在《大陆与海洋:俄罗斯与世界市场》一文的结尾部分写道:

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俄罗斯当代经济的悲惨境地。但即便抛开当下的苦痛,即便展望由成功和创造力塑造的未来前景,它在一定程度上仍会存在缺陷,不仅在于其自身无法满足诸如对热带产品之类的需求,还在于许多其他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海洋作为通往“世界市场”的纽带,对俄罗斯而言是必要的,而且仍将保持必要性;但必须明白“海洋”“航海”原则在构建俄罗斯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本质上是有限的……我们应当确保有效保障,不让敌方海军通过海峡,来破坏黑海沿岸地区。获取通往波斯湾的出海口(哪怕仅从有机会利用这样的“出海口”组织更廉价、更便捷地将热带产品运入俄罗斯内陆这一点来看)是有益的。但必须记住,在俄罗斯经济形成的问题上,这两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次要的。<sup>①</sup>

老一代欧亚派主要活跃于俄罗斯侨民中。他们在政治上,除了继承斯拉夫主义反西化的立场外,面临的新问题是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这里又分为两派:反苏维埃派和亲苏维埃派。在反苏维埃派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完全不适合俄国的国情;他们主张一手打倒西方派,另一手打倒布尔什维克。亲苏维埃派则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虽然来自西欧的法国和德国,但是俄罗斯发生革命的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本土。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国家建设的方案,特别是改弦更张的新经济政策,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处境,而且布尔什维克政党是当时唯一有能力领导俄国的组织力量。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亚派发生严重分裂。其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欧亚派寻求派代表与苏维埃政府谈判合作事宜,但没有成功。1937年,欧亚派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继续发生作用,并影响俄罗斯境内思想界的精英人士。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遭遇危机,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后苏联时期的政治一开始由亲西方的改革派支配,但一系列自由化的改革措施并没有扭转俄罗斯的经济衰落之势,反而使得俄罗斯的实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况下,西方非但没有向俄罗斯伸出援手,反而进一步紧逼,企图彻底肢解俄罗斯。正是出于对这种亲西方改革造成的局面的不满,催生出一个反西方和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而新欧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支派。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吸引力的增加,与公众对西方的不信任感和对苏联某些方面的怀旧感平行。随着新欧亚主义的出现,之前的欧亚主义也被学界称为老一代的欧亚主义或古典的欧亚主义。

列夫·古米廖夫可谓老一代和新一代欧亚主义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苏联国内活动,自称是“最后一位欧亚主义者”,但也被认为是最初的新一代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表示,当别人称他为欧亚主义者时,因为某些原因他不拒绝这个称呼。第一,这是强大历史潮流,如果他吸引到这里,它将给他荣誉。第二,他认真地研究了 this 流派的著作。第三,他实际上

<sup>①</sup> Savitsky, Suhevinsky, Florovsky, Trubetskoy, *Exodus to the East: Forebodings and Events: An Affirmation of the Eurasians*, p. 112.

同意欧亚主义者基本的历史方法论的结论。他的结论是：如果俄罗斯能够被拯救的话，那么只有通过欧亚主义的道路。

亚历山大·杜金是当今俄罗斯最活跃的一位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他经常出现在电视等公共传媒上，其思想在俄罗斯政界和知识精英中广泛传播，甚至被称为“普京的大脑”。这一说法当然有点夸张，普京在某些公开演讲中确实使用了某些与杜金相似的措辞，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和言听计从。杜金的著作丰富，并且大都有英译本，主要著作有：《地缘政治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he Geopolitical Future of Russia*, 1997），《第四种政治理论》（*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2012），《欧亚使命：新欧亚主义导论》（*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2014），《世界—岛的最后之战：当代俄国的地缘政治》（*Last War of the World-Island: The Geo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Russia*, 2015），《永恒政治》（*Politica Aeterna*, 2023）。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的思想语境是后苏联时代的国内和国际的局势。杜金评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内外政策，对此感到极度失望，并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进一步瓦解俄罗斯的意图深感焦虑，在这种背景下他构想了一种重返昔日强大帝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他在《世界—岛的最后之战：当代俄国的地缘政治》开篇之处就写道：

戈尔巴乔夫及其圈子如此无能地失去了“冷战”，更别说叶利钦时期那些天真（甚至可以说是半智半愚）的改革者们因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主权丧失而欢呼，甚至允许外国、大西洋主义势力控制国家，这与所有沙皇时期领土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及苏联时代所有周期的稳定增长相比，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俄罗斯统治者的总汇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名字只能与亚罗波尔克、伪德米特里、舒伊斯基或克伦斯基的名字并列。他们的个性和政治完全是一场彻底的失败。<sup>①</sup>

杜金在其著作中使用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如：“陆权国家”（*Tellurocracy*）、“海权国家”（*Thalassocracy*）、“第四种政治理论”（*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永恒政治”（*Politica Aeterna*）等。如果对照古典欧亚主义，都可以发现其思想源头，从而也便于理解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实质。我们不难发现，“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概念来自老一代的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的著作《大陆与海洋：俄罗斯与世界市场》。杜金所说的“第四种政治理论”指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论，它来源于老一代欧亚主义所宣告的“欧亚主义是一种俄罗斯原创性的民族主义”的主张。之所以称为“第四种”，是相对于“自由主义”（第一种）、“共产主义”（第二种）、“法西斯主义”（第三种）而言的。老一代的欧亚主义者以“俄罗斯原创性的民族主义”对抗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杜金的新说法是加上作为第三种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以示他所提倡的新型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差别。杜金所说的“永恒政治”指的是重视传统价值观念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在老一代欧亚主义者那里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就是东正教的价值观念，而这一点也被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继承。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回归东正教，重视家庭，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扬以民族国家为整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主张精英政治和反对民主政治，致力于培育“交响乐式的人格”和建立分工合作的社会等级秩序。

杜金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代表人物特鲁别茨科伊有关文明多元论和俄罗斯欧亚文化融合论的观点。他在《欧亚使命：新欧亚主义导论》中明确指出：

<sup>①</sup> Alexander Dugin, *Last War of the World-Island: The Geo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Russia*, London: Arktos, 2015, p. 179.

欧亚计划是以一种政治哲学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其基础是文明的多极化、反帝国主义、反现代主义和俄罗斯自身的结构。这是根据斯拉夫主义者的原则来定义的,并积极地评价和重要地增补了俄罗斯人从蒙古时期开始从亚洲社会借来的文化元素。的确,特鲁别茨科伊写的《成吉思汗的遗产》,可谓欧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著作之一。因此,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西方犯错了,这是因为西方把一种纯粹的地区现象,通过帝国主义,假装具有普遍地位;由此进一步说,现代性也是一种西方现象,也完全是这个地区的产物,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sup>①</sup>

老一代欧亚主义反对把西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当作人类社会普遍发展的方向,主张文明的多元论,倡导一种综合斯拉夫精神和亚洲文化因素的广义的民族主义理论。随着苏联的解体,福山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鼓吹“历史终结论”,即把“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宣告为历史目的的终极实现。杜金对此进行反驳,指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只是一种地区性现象,是通过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乃至西方人所说的“现代性”也无非是一种西方的地区性现象,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贬低非西方国家文化落后,认为其必须向西方看齐,实现现代化。杜金坚持欧亚主义是一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文化,反对走西方的道路。

杜金的地缘政治理论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代表人物萨维茨基的思路和基本概念。杜金的《地理政治学基础》是1997年出版的,在同一年他还汇编出版了萨维茨基有关地缘政治的文章,即萨维茨基的《欧亚大陆》文选。在该书导言中,杜金称萨维茨基为第一流的地理政治学家,并强调指出:“欧亚大陆学说在许多方面都是一门地缘政治学。”<sup>②</sup>萨维茨基有关“大陆感”与“海洋感”以及“大陆国家”与“岛国列强”的观点吸引着杜金,因为他将世界历史解释为陆权与海权之间永恒的斗争,并在此格局中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辩护。按照杜金的看法,英美是典型的“海权”国家,俄罗斯是典型的“陆权”国家。俄罗斯只有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以陆地为基础的地区性强权,结成一个陆权国家的联盟,对抗美国和北约以海洋为基础的大西洋主义,才能真正生存下去。

## 结 语

本文叙述了俄罗斯近代史上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对峙的由来,以及从老一代欧亚主义到新一代欧亚主义的发展过程。在结尾处,将从文化发展方式、实践成效和参考意义的角度加以点评。

西方派秉持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发展范式观。西方派认为,西方不但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社会制度也先进。西欧是俄罗斯学习的榜样。西方的发展模式具有普世意义。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代表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普遍的发展方向。

斯拉夫派秉持一种“文化纯洁性”的概念。他们认为斯拉夫文化传统是俄罗斯纯粹的本土文化传统,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和历史的连续性。他们由此区分“我们”和“外邦”,将斯拉夫文化和非斯拉夫文化的差异本质化和绝对化,从而主张凡是斯拉夫的,就应该

<sup>①</sup> Al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2014, p. 17.

<sup>②</sup> Markus Kaiser, *Auf der Suche nach Eurasien: Politik, Religion und Alltagskultur zwischen Russland und Europa*,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4, S. 130.

支持;凡是非斯拉夫的,就必须排斥。简言之,斯拉夫主义的文化发展范式是一种本土单一文化发展范式。

欧亚派持一种跨文化的发展范式。他们认为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承认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主张文化是一种相互交流的共生现象,不仅斯拉夫的东正教文化,还有亚洲文化的因素,都在俄罗斯文化大家庭中发挥积极作用。欧亚主义修正斯拉夫主义过分简化的俄罗斯身份描述,同时反对西方派的普遍主义的亲西方立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了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的理论,并勾画了一幅俄罗斯的文化发展战略图景。

这三种文化范式都对俄罗斯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但又很难依据历史经验客观地评价其成效,这是因为很难确切地估量它们分别对各时期治国政策的影响程度。西方派喜欢援引彼得大帝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成功经验,其代表人物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称赞彼得大帝让俄罗斯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推动俄罗斯向近代化强国转型。斯拉夫派则批评彼得大帝强制西化撕裂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导致俄罗斯人失去了灵魂的根基。对于“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和“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答。斯拉夫派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俄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和整体的凝聚力,把“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归咎于俄罗斯背离了自己的传统,导致社会凝聚力涣散。西方派则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增强,把“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归咎于俄罗斯的西化改革还不彻底。近年来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兴起同样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有关。新欧亚主义者把苏联的解体以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经济改革的失败归咎于亲西方的政策失误,主张通过复兴新型民族主义重振俄罗斯的威望。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的西方派、斯拉夫派和欧亚派的言论和争论多少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有西化派与国粹派之争。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倡以西学的民主和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为核心,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变革;胡适提出“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的主张。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盲目西化导致的文化传统断裂。俄罗斯有关文化发展范式的学说对我们具有鉴戒意义,尤其是欧亚主义的跨文化发展范式,有助于我们考虑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的团结问题。

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的国情与俄罗斯毕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不仅是一个亚洲大陆国家,也面临着广阔的太平洋,在此意义上中国也是一个“海权”国家。中国不仅要发展陆上丝绸之路,也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通过促进与北美、西欧、东南亚、俄罗斯和中亚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实现了自己的经济腾飞,全球化对中国远远利大于弊。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显著,有力推动中国走向繁荣昌盛。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又注意到全人类居住在地球村,需要协商处理全人类命运攸关的共同问题。这样的文化发展模式高瞻远瞩,心胸广阔,不仅为民族谋复兴,还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市,200433)

(责任编辑 朱路遥 徐楷森)